读史阅世

# 方以智“三叩”武夷山

□詹相文

方以智(1611.10—1671.11),字密之,出家后改名大智,别号弘智,又号无可,人称药地和尚,安徽桐城人,明末清初思想家、哲学家、科学家。曾与陈贞慧、冒襄、侯方域等主盟复社,人称“明季四公子”。与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并称为明末“四大思想家”,并以“百科全书派”思想家著称。

清康熙六年(1667年)十月,方以智与钱澄之(初名秉镫,晚号田间老人、西顽道人,安徽桐城人,明末爱国志士、文学家)秋游武夷。方以智在景区七曲金鸡社、六曲响声岩和云窝仙掌峰分别题写内容相同、笔画略异的“南无阿弥陀佛”三幅墨宝,此举在武夷山摩崖石刻史中堪称“唯一”。那么,方以智为什么要在此深深礼叩三声佛号呢?

## 一叩山水 碧水丹山皆胜景

10岁左右的方以智曾随父母泛游武夷。其父方孔炤时任福宁州知州,在武夷五曲云路石上题写下“重洗仙颜”四个大字,并赋诗一首以表达对朱子的尊崇。童年的这次游历给方以智留下深刻的印象,“峭石骨立数十百丈……独武夷有九曲溪,可以击檝……‘重洗仙颜’,老父庚申(1620年)题于云路,盖识之也”。

47年后的1667年秋,方以智以僧人的身份再次踏访武夷山,为丹霞地貌、红绿相映的山光水色所折服,在六曲云窝、天游一带流连忘返。据传方以智曾有长留武夷之意,魏禧《送药地大师游武夷山序》云:“妄意师到武夷,有癯君子为师纳屧折杖,结茆屋居师……师亦当不欲去……师老于武夷,为吾道南主人,未可知也。”

之前曾游鼓山、九鲤,加上今游武夷,方以智汇有《三游诗》,而据王岱(明末清初湖南湘潭人,清康熙间荐举鸿博,官澄海知县,与顾炎武、王士禛、施闰章等友善)《了庵诗文集》卷六《无可和尚三游诗序》所述,此为方以智在青原山所作,王岱于康熙十七年(1678年)从京中友人房慎庵处搜得,汇辑成册并作序,今佚。清董天工《武夷山志》(乾隆刻本)卷十七《寻胜》说方以智“尝寓武夷经年,多所题咏”。很可惜的是,这些题咏武夷的诗句均已散佚。

与之同行的钱秉镫留下七绝《孟冬同无可禅师、李磊英居士游武夷山》四首,其一《登一览台》赞道:“闻到天游客罢游,果然此踞最高头。方知曲曲山回转,合使峰峰水抱流。”从中可见武夷风光的奇绝和客人们尽致的游兴。

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方以智的长子方中德为王梓(号适庵,清康熙年间崇安县令)作《〈武夷宦游稿〉序》。其后,方以智的孙子方正玼在武夷山留下了《小九曲口占》《一览亭观云海》《卧龙潭》《白云庵》数首山水诗。其中《云路石观先曾王父暨先王父题字感赋》云:“武夷胜处溯渊源,大隐屏高精舍存。为傍晦翁瞻故迹,如闻太姥唤曾孙。几经仙腊犹弹指,暂扫荒苔欲断魂。八十余年谁护惜,清泉白石旧乾坤。”则是绍学先人的武夷感怀诗。可以说方以智一家四世皆与武夷有缘,并留下诗文墨宝。名人名山相辉映,诚为武夷之幸。

## 二叩师祖 三教同山添奇观

武夷山儒释道三教同山,和谐共处延绵不绝。南朝梁时期文字训诂家顾野王定居武夷山讲学著述将近20载,史载“崇人知学自顾野王始”,开启了武夷山儒学之先河。

唐武德元年(618年)佛教传入武夷山,僧人在云窝茶洞接笋峰下创建石堂寺,为武夷山最早的寺庙。唐末五代著名道士杜光庭《洞天福地岳渎名山记》将武夷山定性为“升真玄化洞天”,宋代道教经书总集《大宋天宫宝藏》把武夷山确定为道教“第十六洞天”。明末清初的方以智受外祖父吴应宾(自号“三一老人”)儒释道三家合一的观点影响,对儒释道三教的批评与会通思想主要集中在他于清顺治九年(1652年)前后完成的哲学著作《东西均》中。

顺治十年(1653年),方以智重回离别十年的金陵,皈依天界寺的道盛法师。康熙六年(1667年)闰四月,方以智前往福州鼓山为永觉和尚扫塔,辗转莆田等福建各地,而后于秋十月来到武夷山,先拜谒了道盛法师,并为师祖元镜禅师(世称东苑镜禅师)扫塔。其《冬灰录》卷四有《到武夷石屏扫东苑老祖塔》《东苑老祖像前致供》等文可资佐证。

方以智第二次来到武夷山,深感武夷山是三教同山的一座名山,于九曲精华的云窝仙掌峰、响声岩和七曲金鸡社三处,在原有朱熹“逝者如斯”、陈省“空谷传声”“壁立万仞”及“仰之弥高”“天上山”“见石面”等儒道摩崖石刻的基础上,特意增加“南无阿弥陀佛”这句礼赞佛家之语,使得武夷山三教同山特征更显突出。

## 三叩家国 于无声处蕴惊雷

大明王朝灭亡以后,方以智不忘故国,一直秘密地从事反清复明活动。1667年闰四月开始,方以智以僧人的身份作掩护,从北(江西吉安青原山)到南(福建福州),又以为鼓山永觉和尚扫塔的名义,在福建从南到北(福州、莆田、建安、武夷),秘密联络流落在闽的反清势力,而闽北武夷山一带则是联系闽南与赣皖的交通要道。

据方以智后人(十世孙)方叔文《方密之先生年谱》记载:“时文士缁流从而游者数百人,所过名山胜水,乃是藉此机会,宣扬民族意识,激励一线未死之人心,以期复兴中华于异日。”不幸的是,此事被清廷暗中察觉,方以智于康熙十年(1671年)因“粤难”被捕,后有江西万安惶恐滩自沉(或说病亡)一劫。

方以智的福建之行表面看是为祖师扫塔,进行佛事活动,实际上是与隐伏福建各地的反清义士多多接触。方以智从弟方孝标曾一同游览武夷山,留下《游武夷山记》,从中可知方以智一行在武夷山交接的对象除佛教界高僧道盛、居士李卷(字怀之,又字磊英,闽县人,明亡隐居武夷山五曲茶洞,采茗自活,筑室曰“煮霞居”)外,还有当地大户、昆石山房主人蓝润彩,馈赠茶叶者金乾阳等人。

之后,方孝标去谒见靖南王耿继茂、耿精忠父子。“康熙十三年(1674年),耿精忠反,民不聊生,时伪知县林经国百计抚恤,终为无补”(清雍正版《崇安县志》),方孝标、姚文燮这些人纷纷投入“三藩之乱”中,失败后又转入庞大的地下组织洪门和天地会。

据说方以智是天地会的创始人之一。“三点暗藏革命宗,入我洪门莫通风。养成锐气复仇日,誓灭清朝一扫空”,传说为方以智所创。在朝代更替的混乱时期,方以智渴望有一声霹雳惊雷,而他的种种考量与细细准备,何尝不是在酝酿一场震天动地的惊雷呢!

乡土琐记

# 闽清起傅岩:“礼乐”兄弟逆袭记

□苏经强 周至杰 文/图

闽清县云龙乡际上村村口有处摩崖石刻群,崖壁高二三丈,宽十丈许,中央镌刻“起傅岩”三个大字,字径约1米,为楷体直书阴刻。在其左右侧,各勒一道圆首碑状题刻,由于年代久远,右碑已漫漶不清,左边可见一首题为《咏傅岩》的七言律诗:欲识东君信去催,古人止渴意思梅。根茎虽向春前发,枝叶曾经雪里开。万木丛中推作首,千花圃内独为魁。高才应是和羹手,何必须教傅说来。

据载,际上村口“起傅岩”三个大字和《咏傅岩》诗均为宋绍兴二十四年(1154年)状元张孝祥所题写。当时,张孝祥应同榜进士陈和中(陈祥道之侄)的邀请,慕名造访北宋名士陈祥道、陈旸两兄弟故里溆(现为“际”)上有感而发。

起傅岩传说为陈祥道、陈旸旧时读书休息处,而后陈氏兄弟考取功名,这便是诗尾“何必须教傅说来”的由来。作者用“梅花”和“和羹”表达对陈氏兄弟名望之高、才能堪比宰辅之才的咏赞,认为不一定非要附会傅说的传说。《孟子·告子下》云:“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间。”后世常引用“傅说拜相”的故事,说明出身普通的人经历一番磨难,也能取得突出的成就。

陈祥道、陈旸兄弟,为北宋中期崇尚王安石“新学”的重要学者,在宋代学术思想史,特别是中国古代礼乐学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真正让陈旸显名主要是因其两部著作,一为“徽宗初,进《迂衡集》以劝导绍述,得太学博士、秘书省正字”,二为“旸所著《乐书》二十卷贯穿明备,乞援其兄祥道进《礼书》故事给札。既上,迁太常丞,进驾部员外郎,为讲议司参详礼乐官……进鸿胪太常少卿、礼部侍郎,以显谟阁待制提举醴泉观”。可见,陈旸后升迁至礼部侍郎等要职主要得益于《乐书》。

陈祥道,字用之,治平四年(1067年)进士及第。其行状、墓志铭等全无留存,《宋史》中仅在陈旸传后有载陈祥道“元祐中,为太常博士,终秘书省正字。所著《礼书》一百五十卷,与旸《乐书》并行于世”。陈祥道以著《礼书》而闻名于世,《淳熙三山志》卷八载陈祥道“尝著《礼书》。王安石以闻,诏尚书给笔札以进。除国子监直讲”。元丰初官制改革,“诏改国子监直讲为太学博士”,陈祥道也因此转任太学博士。《宋会要辑稿》则载宋哲宗元祐四年(1089年)二月,翰林学士许将荐举:“太学博士陈祥道尤深于礼……望试以礼官,取所为书付之有司。”遂诏以陈祥道为太常博士。而陈祥道“终秘书省正字”则得益于范祖禹的举荐,据《范太史集》卷二三《荐陈祥道礼官劄子》云:“臣伏见秘书省正字陈祥道深于礼学……上其所着《礼书》一百五十卷,蒙擢寘秘省校正之职。”由此一来,兄陈祥道著《礼书》,弟陈旸著《乐书》,这对“礼乐”兄弟因此而成为当时名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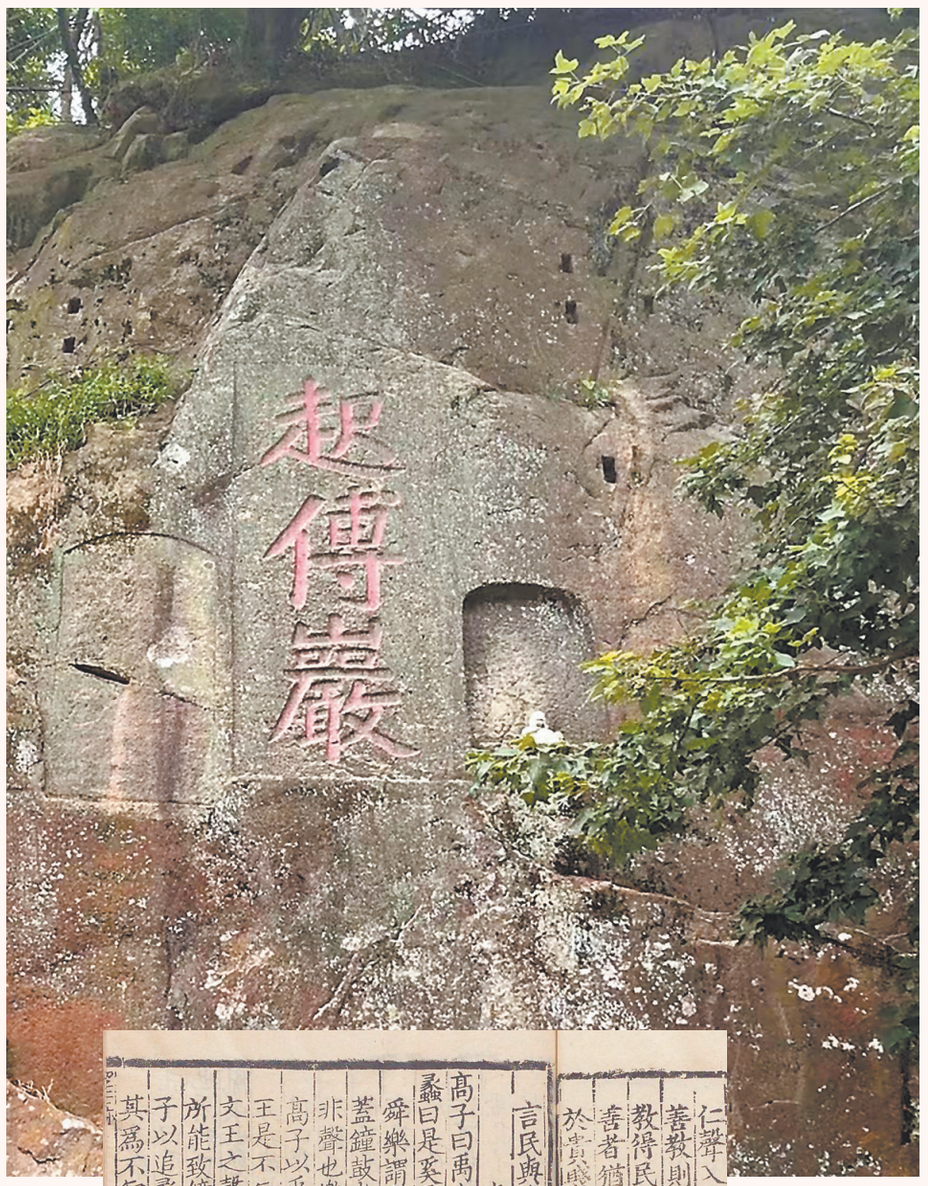
“礼乐”兄弟能取得这样的成就并不容易。陈氏兄弟并非出身名门望族,相反却是家道贫寒。《乐书》载礼部文牒中有“祥道家贫无缘上进《礼书》”,再据诸本族谱所载,陈氏兄弟家道实为贫寒,陈祥道“初仕时,父殁公人死,而祥道任其罪,久废”,致其赋闲在家发愤20年。

元祐五年(1090年),陈祥道完成一百五十卷的《礼书》,并得以进献朝廷,其也因《礼书》才得以“迁秘书省正字,赐緋衣太学博士”。《礼书》总结归纳了先秦礼制,梳理了历代礼制沿革的方式,考订了礼制中名物形制功用和行礼仪节方位,是一部通礼类的礼学著作。《礼书》问世之后,翰林侍讲学士、国史院修撰范祖禹称赞说“精详博洽,非诸儒所及”。北宋文学家李廌称“《礼书》通博,一时少及”。明代著名学者张溥在《礼书叙》中将陈祥道《礼书》与朱熹《仪礼经传通解》相提并论,认为前者为枝叶,后者为根本,二者互补,读礼习礼者应将二书并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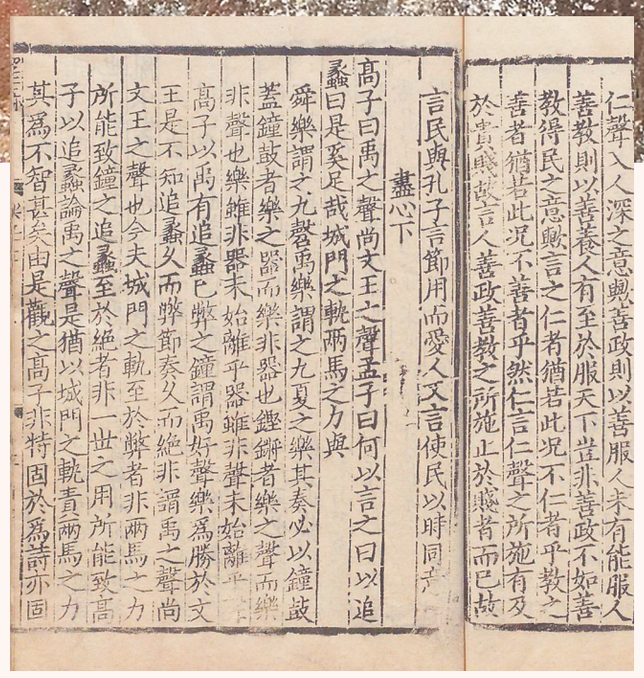
至陈旸时,家境并未改善。据当地文史资料记载,1983年陈旸生母谢氏的墓葬因墓地纠纷被扒,该墓为单穴石拱塘,无墓志铭,也未见实物、明器、陶俑之类的殉葬品,实为清寒人家的墓葬,足见陈氏兄弟的确出身寒苦。

陈旸仕途与其兄陈祥道相比,虽然较为顺利,但他所处的政治环境却是北宋最为糟糕的时候。陈旸科举取第后,被授初等职官堂除,在离京城开封不远的京西北路的顺昌军掌勘问刑狱七八年,正值朋党之争如火如荼之时。北宋士大夫间因政见引起的党争萌芽于仁宗景祐、庆历年间,盛行于神宗熙宁以后,大致经历了熙丰新政、元祐更化和绍圣以后“绍述”三个阶段,直至北宋灭亡。其间的元祐更化是北宋党人在政治斗争中全面趋向情绪化、意气化的8年。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陈旸中举进入宋室文官系统,首先面对的是愈演愈烈的朋党之争。成书于宋徽宗崇宁二年(1103年)的《乐书》,正是陈旸不随波逐流、趋炎附势,反而是潜心礼乐的研究,最后才得以著写而成。《乐书》也是世界第一部音乐百科全书,比欧洲第一部音乐百科全书德国《音乐词典》还早600多年。《四库全书总目·乐书提要》在收录《乐书》时载:“北宋乐书惟《皇祐新乐图记》及此书存耳。”评价不可谓不高。

中国传统社会十分重视礼乐文化,出身布衣、家道贫寒的陈祥道、陈旸兄弟先后完成《礼书》《乐书》,由此奠定了他们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朱熹曾以“棣萼一门双理学,梅溪千古两先生”诗句高度评价这对兄弟,真可谓是一场成功的人生逆袭。




▲『起傅岩』石刻


言民與孔子言節用而愛人又言使民以時同子
盡心下
高子曰禹之聲尚文王之聲孟子曰何以言之曰以追
曰是奚足哉城門之軌兩馬之力與
舜樂謂之九韶禹樂謂之九夏之樂其奏必以鐘鼓
蓋鐘鼓者樂之器而樂非器也鼗鼓者樂之聲而樂
非聲也樂雖非器未始離乎器雖非聲未始離乎
高子以禹有追蠡已弊之鐘謂禹好聲樂爲勝於文
王是不知追蠡久而弊節奏久而絕非謂禹之聲尚
文王之聲也今夫城門之軌至於弊者非兩馬之力
所能致鐘之追蠡至於絕者非一世之用所能致高
子以追蠡論禹之聲是猶以城門之軌責兩馬之力
其爲不智甚矣由是觀之高子非特固於爲詩亦固
仁聲入人深之意與善政則以善服人未有能服人
善教則以善養人有至於服天下豈非善政不如善
教得民之意歟言之仁者猶若此況不仁者乎教之
善者猶若此況不善者乎然仁言仁聲之所施有及
於貴賤故言人善政善教之所施止於聽者而已故

◀《乐书》书影

闽人遗事

# 方声洞:清末闽籍留学生的使命担当

□胡振宇

方声洞,字子明,福建侯官人。1886年6月出生于福州城北九彩园。1902年赴日,就读于日本成城学校。1905年加入同盟会,同年因母丧返闽。1906年再次赴日,入学千叶医专。1911年参加广州黄花岗起义,不幸牺牲。

方声洞少年时随父赴鄂,就读于新式学堂。在鄂期间,方声洞时常目睹西方列强依仗与清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肆意欺凌国人,这也更进一步激起了他的爱国心。他常以其兄方声涛为榜样,在日常生活中强调“劳则习苦,俭则不匮”的精神,以便日后“能与士卒忍饥劳涉险阻”,从而仿照其兄,以军事振兴中华。

1902年,方声洞跟随方声涛等赴日留学,一同就读于成城学校。当时清政府禁止没有督抚担保的自费生学习军事。方声洞并非官派生,因此其虽就读于成城学校,但所学并非军事科,而为普通文科,这一点从方声洞两年半的学制上亦可体现。但成城学校毕竟是军事类院校,其文科课程亦包括体操、剑术、射击、距离测量、野外演习等众多军事课程,相较于军事科而言,仅缺少了“典令教范科”课程。方声洞在校期间勤勉好学,每天凌晨五点起床学习,晚上九点熄灯就寝,数年如一日。成城学校的就读经历,也为方声洞日后的起义活动奠定了军事基础。

1903年3月29日,成城学校举办了以中日学生为主要参赛对象的运动会,但运动场上所悬挂的万国旗中唯独没有象征着中国的黄龙旗。对此,以方声洞为主的成城学校留学生认为学校所悬挂之万国旗“各国皆有,而我独无,是明明不耻我于诸国也”,认为这是对中国的羞辱,遂向校方提出强烈抗议,要求校方悬挂中国国旗。

起初,校方对中国留学生的抗议置之不理。对此,方声洞等中国留学生遂相约拒绝参加运动会。他们或在宿舍教室中相拥而泣,表达不满;或立于要路,阻止国人参加这一辱华运动会,以示抗议。最终,“日人始惧,转瞬间黄龙大旗与日本国旗交叉于门首,而小旗亦与各国旗飘摇”。但事情发展至此,方声洞等中国留学生依旧没有一人参加此种侮辱中国的运动会。中国留学生的抗议,不仅在一定程度上使得部分日人看到了中国青年捍卫祖国尊严的决心,同时也彰显了近代中国留日生的爱国之情。

1905年8月,孙中山于东京成立中国同盟会,方声洞率先响应,成为同盟会的首批会员。不久,方声洞因母忧被迫返闽,但其革命事业却并未搁置,归国期间积极从事民风开化活动,创办了面向大众的书报阅览所,以图将革命思想普及于世。

1906年,守丧期满的方声洞再次东渡。他本意继续学习军事,但此时中日两国政府已进一步加强对留日生的控制,对学生的就读学校、所学专业等进行了较为严格的限制。无奈之下,方声洞只得退而求其次,就读于千叶医专。在校期间,方声洞一方面刻苦学习外科学、解剖学与卫生学等10类33门专业课程,另一方面依旧不忘化学、物理等公共学科的学习,希望自学制造炸弹,为革命起义提供武器。

同时,方声洞还积极从事联络党人、运送军火等革命活动,并曾出任中国留学生总代表、福建同乡会议事部部长与同盟会福建支部部长等职。1908年,革命领袖黄兴作诗赞扬方声洞:“飞扬遥想汉将军,下马还书露布文。风卷黄沙歌出塞,燕然山畔纪功勋。”

1911年初,同盟会决议抽调骨干力量发动广州起义。方声洞得知这一消息后彻夜难眠,随即开始积极准备归国起义事宜。但方声洞所在的同盟会福建支部考虑到他长子未满周岁,妻子尚有身孕,且同盟会福建支部也需骨干主持事宜,因而决定让方声洞留守东京。方声洞闻讯,遂诘问为何“诸君不许吾同死耶”,指出“义师起,军医必不可缺”,自身习医数载,长于医护,能在起义中发挥重要作用,并说:“且吾愿为国捐躯久矣,今有死所,奈何阻我去?况事败诸君尽死,我能独生耶?留我奚益?”

对此,林文等人向他解释革命强调前赴后继,如果此次起义不利,他日还可卷土重来。如若此次闽籍留日生皆一同就义,日后义旗再举,闽省无人响应,岂不令人哂笑,因此“今日留君,正以君堪重任,而未客轻于一掷耳”。方声洞虽心有不甘,但仍以大局为重,服从组织安排,留守东京。

1911年3月中旬,方声洞忽接吴玉章来信,告知起义军火不足,请其秘运军火以作接济。之后,方声洞一方面积极筹备军火,另一方面在第一时间内完成了相关职务交接。3月28日起,方声洞开始运送起义所需军火,并于4月初如数运抵香港。方声洞深知广州起义事关革命成功与否,而多一人为之奋斗,起义便多一分成功的希望,因此,他在抵达香港后毅然谢绝了部分同志劝其返日的建议,决心献身革命。

起义前夕,方声洞分别给父亲与妻子留下了绝笔信。他在《禀父书》中向父亲解释了起义之因,指出自己对于家庭本有应尽之责任,但家国不能并顾,忠孝不能两全,现国家蒙难,所以“一切家事,均不能为大人分忧,甚为抱憾”,强调“虽奋斗而死,亦大乐也;且为祖国而死,亦义所应尔也”,况且“事败则中国不免于亡,四万万人皆死,不特儿一人;如事成则四万万人皆生,儿虽死亦乐也”,因而“但望大人以国事为心,勿伤儿之死”。

他在《与妻书》中告诉妻子“当吾由东承运军火来港时,已决志捐躯于沙场,为祖国报仇,为四万万同胞求幸福,以尽国民之责任。所不即行相告者,恐吾爱卿以吾赴死为悲耳。刻吾为大义而死,死得其所”,请妻不要难过。

1911年4月27日,广州起义如期爆发。年仅25岁的方声洞身先士卒,英勇作战,最终不幸牺牲,却给后人留下了可歌可泣的感人事迹。